

“一二九”运动前北平地下党的活动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和热河之后，罪恶的铁蹄又践踏察东和冀东，威逼天津、北平。在这华北危机，民族危难的时刻，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抗日救亡运动，瞬息之间，抗日的洪流席卷全国，发展成全民族的抗日爱国运动。

有人说这一伟大爱国运动是学生们自发搞起来的，事实证明，它既不是自发的，也不是由个别共产党员自己搞起来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北平党组织领导下发动起来的，它是党在艰苦的白色恐怖下，从思想上、组织上和政治上长期工作的结果。

一

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连续遭到重大破坏，党团员横遭镇压。但共产党员前仆后继，坚持不懈地进行战斗，新的党组织又相继建立起来。1934年底，王健（王学明）和彭涛把各自联系的党团员合在一起，约有十几个人，他们相约一边寻找党的组织，一边开展工作，着手恢复党团组织。王健负责与上级联系，彭涛负责恢复共青团，谷峰（谷景生）负责恢复“左联”和“文总”等群众组织。1935年春，王健与新建立的北平市委取得了联系，恢复了组织关系，市委肯定了他们所做的工作，并决定由王健等组织共青团北平市委。

5月下旬，北平市委又遭大破坏，书记许子云和党团员三十四人被捕。团市委和彭涛联系的一部分同志得以幸免。这期间，朱子贞（冷楚）、梁寒冰等联络的一部分党员也与王健建立了联系。

6、7月间，王健与中共河北省委取得联系，省委指定他和彭涛、杨子英组成“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王任书记，彭为宣传部长，杨为组织部长，9月朱子贞接任组织部长。在工委领导下的有共青团和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负责人杨子英、周小舟、朱子贞）及“左联”与“文总”（负责人谷峰）。

这期间，根据上级党的精神，北平市工委决定大力发展群众性爱国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通过该会重新组织被国民党摧残的革命力量。

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是1934年4月20日由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等1779人签名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系由我党起草制定），呼吁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实行武装自卫，宣布成立“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筹备会”后，于同年5月正式成立的。在成立后的三个月里，就有三十万各界人士签名赞成它的纲领，并加入该会。很快，各地（包括海外华侨）先后成立了分会。8月20日，华北分会成立，并发表《告华北同胞书》。

是年7月，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以下简称武卫会）发表《反日宣言》指出：中国民众，除了抗日，再无出路。号召中国人民丢掉对国民党的幻想，排除一切对日作战的障碍，团结起来，结成反日统一战线，在民族自卫旗帜下武装自己，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它的成立使一切爱国者为之精神振奋。但在爱国有罪，冤狱遍地的国统区，武卫会一成立便遭到国民党的镇压和破坏，不得不转入地下。

1935年5月，北平武卫会正式成立，杨子英任书记，周小舟任宣传部长，朱子贞为组织部长，后接任书记。

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使华北有重蹈东北覆辙的危险，广大爱国学生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悲愤已极。在他们为祖国的命运而焦虑，急切寻求救国道路的时候，武卫会纲领和宣言的发表，使那些在苦闷中彷徨的青年看到了希望。

经过深入的宣传发动，1935年秋，武卫会组织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在大中学校学生中发展较快。周小舟负责在大学开展工作，清华大学、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平大法商学院等校相继建立了武卫会组织，一批爱国学生加入了武卫会，各校都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经过斗争的锻炼，他们都成长为学生运动的骨干。如姚克广（姚依林）、牛荫冠、蒋南翔、敖白枫（高锦明）、曹鹏翔（华诚一）、王仁忱、俞启威（黄敬）、刘文卓（刘导生）、宋黎、郑洪轩、关山复、邹素寒（邹鲁风）、董毓华、甘一飞、王大钧、裴梦飞等。他们当中，有的已是党团员，有的是失去联系的党团员找到了组织，有的是新参加党团组织的。

在中学里，女一中、镜湖中学、师大女附中、女二中等校武卫会组织比较活跃，许多进步学生加入了武卫会，也出现了一批活动分子，如郭桂英（郭明秋）、杨彤、邵清华、孙敬文、高慧如等，他们先后参加了党团组织，在学生中发挥了骨干先锋作用。女一中教师中进步力量比较强，在孙荪荃的影响下，他们积极支持学生救亡运动，使得女一中成为建立学生自治会极少数学校之一。

长期以来，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解散了北平的抗日团体，各校学生自治会被取缔。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上级党组织指示：运用最广泛的反日统一战线，争取公开活动，摒弃狭隘的关门主义，只要赞成与拥护抗日，都使之团结在武卫会的周围，推动群众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1935年7、8月间，暴雨成灾，黄河泛滥，成千上万的灾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彭涛、周小舟根据上级指示，在西山一个法国人的别墅里召集武卫会骨干会议，参加者有姚克广和俞启威等，决定以各校武卫会为核心，组织水灾救济会，开展救灾活动，争取合法化，以灰色团体掩护党的组织。会后，各校纷纷成立了水灾

救济会。9月，各校代表在女一中开会，正式成立“北平大中学校水灾救济会”，选举吴闰箴为主席，姚克广为记录。事后到当局备案，取得了合法地位。募捐救灾活动，得到了市民的同情和支持。

武卫会的活动得到迅速发展，党组织通过它做了几项工作：（1）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爱国青年吸引到武卫会周围；（2）发展会员，建立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基本队伍，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骨干；（3）推动了各校学生自治会的恢复和建立。总之，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武卫会在学校中迅速发展和水灾救济会的建立，聚集了一批进步力量，为“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做了组织上的准备，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

当时，在北平、天津的一些大学里，有几位在中共河北省委直接领导下的共产党员和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研究的学者及进步的教授，冒着坐牢和解聘的危险，在大学的讲台上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如黄松龄、陈豹隐（陈启修）、王慎明（王思华）、许德珩、吕振羽（吕一清）、徐冰、温健公、张申府、阮慕韩、谭丕模、齐燕铭等等。

应该特别加以介绍的是：

李达（李鹤鸣），在平大法商学院、中国大学和朝阳学院任教，开设了社会发展史、货币学和社会学等课程，其内容均是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他明确表示，他是为了帮助革命战士，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去认识社会现象，借以指导实践。他在《社会学大纲》中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人，必须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全国人民要一致团结起来，准备民族奋斗，以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

杨秀峰（杨秀林），在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和天津河北法商学院任教，讲授法俄革命史、社会主义思想史、社会科学方法论等六、七门课程，他的课深受学生们的欢迎，每次讲课，教室里都坐满了人，甚至窗外都站满了听讲的学生。不仅如此，他还身体力行，启发引导学生从事救国活动，团结同事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

吴承仕，以研究经学著称，这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历史，创办进步刊物《文史》与《盍旦》，宣传马克思主义，评论时局，抨击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批判“读书救国论”，呼吁当局给人民抗日之自由，在青年学生中发生了深刻影响。在他担任系主任的中国大学国学系，规定社会科学概论（即马克思主义学说）和《资本论》为必修课，考试不及格者不准毕业。一九三六年，他在抗日救国运动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在进步教授当中，如徐冰、杨秀峰、黄松龄、温健公、阮慕韩等均系中共党员，他们利用教授的公开身份，在北平天津文化教育界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了一批学者教授，进步教授们较早看到共产国际七大的文件和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为抗日救亡告全体同胞书》。他们多次开会研究发动救国运动，并且分工联系各大学，推动了“一二九”运动的爆发。

三

在局势日益严重，华北危在旦夕的关头，周小舟、彭涛等通过不同的途径看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报告和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他们根据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在党内提出了团结各种抗日力量，与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争取抗日民主自由的主张。但是这一主张却遭到中共北平工委书记王健和朱子贞的反对，他们认为当前不是向国民党要求民主的问题，而是应组织暴动，打倒国民党，建立北方苏维埃。

彭涛、周小舟等遂写信给河北省委，申述自己的意见，王健不予转信。彭、周等坚持以合法斗争发动抗日救亡运动的主张，又联名写信给河北省委，并派杨子英到天津向省委报告。王、朱对彭、周等采取了压制打压的态度，给他们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并企图阻止他们发动抗日救亡运动。

此时，国民党要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彭、周等人在学生中发动争取抗日民主自由运动，向国民党要求抗日民主自由。于是，由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邀集平津十校学生代表协商起草了《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十一月一日，在《大公报》用联名电呈国民党六中全会的形式发表，谴责国民党对外屈辱妥协，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要求“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这一要求抗日爱国自由的行动，表达了中国青年的强烈爱国热情和抗日自由的渴望，得到广大学生的响应。由于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党组织赢得了主动权。

彭涛、周小舟等不顾压制打击，积极开展工作，团结的爱国学生愈来愈多，一些学校陆续酝酿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他们将水灾救济会转变为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学联于11月18日正式成立，选举了领导机构，执行主席为女一中（郭桂英），秘书为清华大学（姚克广），总交通为镜湖中学（孙敬文），总纠察为东北大学（邹素寒），总交际为燕京大学（王汝梅），宣传为师范大学（杜书田）。北平学联办公地点设在女一中，学联党团负责人为彭涛、周小舟、谷峰。

与此同时，彭涛、周小舟、谷峰等积极向河北省委报告自己的意见和北平党内存在的问题，以及他们和王、朱的分歧。又派周小舟到天津，直接向省委

做了汇报，中共河北省委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肯定了他们所进行的工作，批准了他们提出的政治主张。并且根据形势需要，撤销了北平工委，决定由谷峰、彭涛、周小舟组成中共北平临时委员会。它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掀起抗日救亡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其一手制造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同时决定派李常青为省委特派员驻北平，代表省委领导北平党的工作。

十一月，李常青来到北平，着手整顿党的工作，他支持彭涛、周小舟等人所从事的工作。这时正值“一二九”运动爆发前夜，准备工作正紧张地进行，形势不允许对斗争有丝毫的懈怠和犹豫，稍有贻误就会失去时机。鉴于王、朱坚持己见，李常青遂果断决定由他自己兼任书记，直接领导各党团组织。

中共北平党组织通过群众组织——北平学联和各校学生自治会，在青年学生中做了艰苦细致的发动工作，抗日救国已成为广大学生的强烈愿望，他们不失时机点燃了抗日的怒火，发动了“一二九”爱国运动，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响应，形成一个全民族的抗日浪潮。它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影响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可谓我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史上光辉范例。

李常青、彭涛、周小舟作为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是这一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们能够根据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战胜了“左”倾关门主义，冲破种种阻力，组织发动了“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的抗日高潮，他们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他们在“一二九”运动中所起的历史作用却鲜为人知，一是由于他们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单线联系，不易被人所知；二是李常青和周小舟在党内先后受到错误的打击，他们的历史功绩无法得到公正的评价。我们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还历史本来的面目。

（作者麻星甫、柏玉江，原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12期，原文有删减。）